

本土社會研究叢書之三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下）

實 徵 調 查

楊善華
羅沛霖 主編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土社會研究叢書之三

阮新邦主編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下)

實徵調查

楊善華 羅沛霖 主編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 (下) 實徵調查

主 編 楊善華 羅沛霖

出 版 者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1060 Main Street, River Edge,

NJ 07661, USA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初 版 2000年11月

國際書號 ISBN 1-879771-48-9 (pbk)

版權所有 ©2000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叢書主編：

阮新邦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編審委員：

蘇國勛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

謝立中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翟學偉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

林 端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陳介玄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曾乃明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本土社會研究叢書序

早在三、四十年代便有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推廣，但其時的本土化研究，主要是建立一些適合國情的“實質”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社會狀況，較少觸及根本性的問題。這時期的討論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也由於種種客觀的社會和政治因素使然，討論很快便中止了。直至八十年代初期，這一個課題在華人社會科學界再次引起討論。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尤其是心理學界，這些年來在理論和概念層次上，以及實徵社會研究裏，做了不少顯著的工作。然而，另一方面，無論是早期中國大陸的學者或現在港台的社會科學家，他(她)們在這方面的探討多集中在理論和概念上的建構，以及把這些建構應用在實徵的社會調查上。這當然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重點工作，但有一點是這些學者所忽略的，是自六十年代末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對社會科學本質所作的反思。西方學術界在這問題上的探討既深且廣，使得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愈來愈多社會科學家發現社會研究的局限性，他(她)們對“科學”、“真”、“客觀”和“驗證”等概念有重新的認識和理解。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再不是原先想像般把社會

v
April 20/17

事實不變地描繪出來。以往要建立的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性”，也不能像自然科學般，其解釋力是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而可能只是用來解釋某個社會的特定時間內的現象。

這是問題的關鍵。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推廣運動，是源於不能純依靠建基在西方文化脈絡之上的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社會現象。然而，如何才可以較精確解釋社會現象卻是近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因此，這也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重要課題。當然，這並不是說先要解決此課題才可以從事理論及實徵層面的本土化研究。反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問題是沒有最後的一致答案的。但要指出的是，對這些問題的一定理解可以促使研究者更能明白社會研究的本質及局限，以及明瞭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各種不同層次的建構。這樣會減低對本土化研究的過高期望或迷惘，同時亦有助於建立本土取向的理論架去從事實徵社會研究。

本系列叢書是順應着這一背景脈絡而產生。其主旨是要推廣本土化社會研究，建立適合華人社會的本土理論和概念，並由此結合西方的社會理論來解釋華人的社會現象和行爲。本叢書的範圍包括哲學和後設理論層面的本土化探索、本土理論的建構、以及建基於本土角度的實徵社會調查。本叢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國內簡體字版，八方文化企業公司出版海外繁體字版。

阮新邦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五日

序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後，中國政府於一九七九年開始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首先受影響的是農村地區，其經濟體制出現了結構性的根本改變，這特別顯現於南方沿海的農村，這地區的經濟建設的發展尤其迅速。另一方面，隨着經濟不斷發展，政治環境也慢慢地寬鬆起來。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傳統宗族活動，也在八十年代開始復蘇。然而，經濟的活躍發展同時也帶來社會結構上的變化。這裏出現一些頗為吊詭的現象。一方面是宗族活動的復蘇似乎重新強化了傳統上尊下卑的人際關係，但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所衍生的功利主義和自主意識趨向的價值觀，卻似乎沖擊着傳統的人際關係。這是否會削弱了伴隨着宗族活動復蘇的傳統家族文化對人的影響力呢？為了探討經濟現代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影響，我們從一九九四年起，在珠江三角洲的一條農村進行田野考察式的研究，目的是要檢視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下的現代化發展與傳統家族文

化之間的張力。經過四年多的努力，我們於一九九八年完成了《婚姻、性別與性：一個當代中國農村的考察》一書，¹發表了我們研究的初步結果。該書主要闡述中國南部農村有關婚姻觀念、兩性關係、及對性等觀念的變遷。

於一九九六年初，在撰寫上述研究報告期間，我們把研究範圍擴展至北方的農村，希望透過比較南北農村的特徵及變化過程，擴闊和加深理解經濟現代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影響。我們的研究發現，南北農村無論在經濟發展的程度，或者是家族結構的表徵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就我們所研究的北方田野地點而言，其經濟建設大為落後於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村。我們的研究仍然在進行中，其中的一個重點是放在兩地農村的差異及變遷的比較上。我們認為現在是適當的時候發表我們研究的部分結果。但在現階段，我們仍未把南北田野資料作較詳細的比較，我們的研究報告是以獨立的文章形式出現。在理論和實徵層面上揭示中國農村研究的一些重要特徵。我們把這些文章編成上下兩冊書。上篇專注理論探索，分別環繞着社會研究的本質、農村研究的理論建構、及社會科學本土化三個課題而開展。下篇則屬於實徵調查的範圍。

我們進行實徵調查的田野地點包括了南方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北方河北省及山西省的農村。這項研究的田野資料搜集工作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進行，直至一九九九年

中才完成第一個階段的工作。北方河北省農村田野地點的資料搜集工作，主要是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師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工作人員負責，參加調查的有：劉小京、唐軍、楊善華、程為敏、李孟、侯紅蕊、趙力濤、羅剛、吳愈曉、陳剛和樊欲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主要負責南方農村田野地點的資料搜集工作，工作人員包括：阮新邦、朱偉志、羅沛霖、李秀國和李晶。而李晶則主要參與山西省的農村的田野研究工作。

我們這幾年來在資料搜集過程中，看見改革開放政策推行後，南方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村發展迅速。特別是一些靠近運輸幹道的農村，大部分已由農業經濟結構轉變至工業經濟結構。就以我們所研究的南方的其中的一條農村為例，於一九七九年才只有兩間由香港遷進去的工廠，進行來料加工的生產業務。但是在這二十年間，工廠數目增至六十多間，分別有港商、台商、外商及本地人經營，生產各類型內銷及外銷的商品，僱用外省民工人數達三萬多人，一條本來只有六百多戶、二千人居住的農村已轉變成廠廈林立的工業社區。村民絕大部分已經離開農田，跑到工廠工作，或是經營各類型的生意。迅速的經濟發展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我們可以看見村內愈來愈多的三層西式石屎樓房坐落在村內，而舊式簡陋農舍已被棄置、改建或是租予外省民工。差不多每戶都擁有基本的家居電器用品了。在晚近這幾年裏，電器用品的質素更大

為提升，愈來愈多人擁有組合音響、鐳射光碟機等先進視聽器材。一些富有的幹部或村民除了家居裝修豪華外，更擁有二至三部進口的名貴房車。村內農村合作基金會在一九九八年底達一億元人民幣的存款亦反映了整條農村的富裕程度。這是珠江三角洲一帶相當普遍的現象。

北方的農村在改革開放政策推行後，村民生活水平也有顯著的提高。就以我們在河北省的一個田野地點而言，其經濟建設已經朝向工業化的方向發展，並且被當地政府評為“小康樣板村”。可是這一條“小康樣板村”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是遠為落後於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村。雖然村內差不多每戶都翻蓋了新房屋，但仍然相當簡陋。村民每年人均收入只有三千多元人民幣，村戶存款平均不多於二萬元。就北方的農村而言，村內的物資供應已經算得上是豐富，但是其水平是僅冀及珠江三角洲八十年代初期的農村。村內雖然有二百多戶、八百多人，但全村只有四輛汽車、三十輛摩托車。年生產能力達百萬元以上的鄉鎮企業只有四家；而其中兩家在縣裏已經有一定知名度的企業，其年產能力也只達四、五百萬元左右，遠遠落後於南方發達農村的鄉鎮企業。至於我們所研究的另一條位於山西省的農村，經濟改革的成效相對過往來說雖然是顯著的，可是由於資源貧乏，交通不便，傳統農業生產至今仍是主導地位的生計方式，其經濟發展更為落後。

在這十幾年裏，南方農村的經濟發展雖然遠較北方迅

速、復蘇的傳統宗族活動也比北方的活躍，然而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影響下，強調宗族之間親疏有別的传统交易模式慢慢被以市場價值主導的交易方式所取代，再加上強調功利意識、財富的追求、以及縱情色欲等現象彌漫着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村社會，維繫着社會關係、以及起着“終極關懷”的作用的傳統家族文化，在南方農村社會裏對人的影響力日漸減弱。另一方面，雖然市場經濟對北方農村社會有一定的影響，或許由於北方農村的經濟發展仍然遠為落後於南方的農村，家族的差序關係，似乎仍然影響着鄉鎮企業的結構、集資及生意往來等問題，親疏有別的传统交易模式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這似乎顯示了家族文化在北方農村社會裏對人際關係網絡和利益的分配程序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基於以上的初步了解，在本篇的實徵調查報告裏，我們嘗試透過農村宗族結構、宗族復興、家族糾紛、婦女自主性、農村人際關係等問題，揭示南北兩地農村社會在改革開放歷程上的差異，進而了解兩地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的張力。我們這裏提供的文章只是反映了家族活動和家族意識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其中一些變化。我們的研究仍然在進行中，我們日後會陸續發表有關南北農村研究的理論探索及實徵研究的結果。

這些研究得以順利進行，首先要感謝各田野地點的報導人，² 他(她)們不僅為我們提供資料，也很多時照顧我們在村裏的生活。我們特別感謝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

系主任麥萍施教授，這些年來對我們的支持和鼓勵。
最後我們要多謝香港理工大學對這項研究的資助。

楊善華 羅沛霖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釋：

- 1 阮新邦、羅沛霖、賀玉英，《婚姻、性別與性：一個中國當代農村的考察》（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8）。
- 2 本書內的大部分村名、人名及地名都是虛擬的名字。

目 錄

本土社會研究叢書序

序

- 一 家族政治與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
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以河北某縣鄧家莊為例 1
楊善華
- 二 誰在調解？——華北農村家族糾紛的調解過程、
策略和一般模式 63
劉小京
- 三 婦女自主性與家族文化結構 99
程為敏

四 從家族成員的理性行動到家族群體的自覺生長： 對當代華北村落家族群體的一項社會學研究 唐 軍	127
五 人際關係與自我觀的建構：經驗研究 李 晶	161
六 工業化、家族文化與經濟發展——珠江三角洲 鄉村的人類學考察 李秀國	201
七 凝聚與分裂——宗族結構及其變化 羅沛霖	253
編者及作者簡介	293



家族政治與農村基層政治精英 的選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 ——以河北某縣鄧家莊爲例

楊善華

1. 引言

中國大陸鄉村政治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說是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研究、中國國家、社會和民衆關係研究中一個最引人注意的問題。以往國內和國外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專家學者(其中有相當多社會學家)對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理論、概念和見解，試圖對這一問題，尤其是1949年後的情況給出一個較爲圓滿的描述和解釋。早期的有費孝通的“雙軌政治”、¹ 孔飛力的“士紳操縱”、² 杜贊奇的“經紀體制”。³ 80年代之後，有司考特·羅澤爾所借用的由斯第格里茨提出的“主人——代理人”理論、⁴ 有王思斌的“邊際人”理論，⁵ 有宿勝軍的“保護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論，⁶ 有金·奧伊的“庇護關係”理論⁷ 等。

作爲一種理論概括，這些概念(理論)有點像當年馬克斯·韋伯所提的理想類型。即它們在突出了精英在所處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主要特徵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也要略去一些屬於這些概念和理論的內

2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

涵但可能是次要的部分，也會失去它們從中提煉出來的那種現實生活的生動性和豐富性，失去構成它們前提的社會的制度和背景。這就構成了在這裏重新討論這些概念(理論)的可能。

國外用來描述改革前後中國農村社區精英變動的理論觀點主要有兩派：一派是精英回圈理論，一派是精英再生產理論。精英回圈理論把精英的更替視為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⁸ 新精英的產生和舊精英的退出是這一過程相伴相隨的兩個方面。對於中國，就是說改革後形成的農村社區精英集團在人員構成上較改革之前的舊精英集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湧現的精英人物進入精英集團，取代了那些落伍的舊精英的位置；⁹ 精英再生產理論更傾向於把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個精英集團內部角色轉換的過程。¹⁰ 舊精英集團就像是一個原始胚胎，在社會轉型的催化下，孕育出、分化出不同類型的精英分子。而王漢生則通過她的實地調查提出了更全面的看法。她認為，改革以來農村社區精英的變動，既有新精英對舊精英的替代，又有舊精英集團內部的差異和轉換。¹¹ 因為這些理論基本上都來自於對經驗研究取得的資料的概括和提煉，而人類學式的田野工作不可能在這方面取得總體性的資料。所以這樣的概括和歸納對照現實生活的廣闊、生動、複雜和豐富總不可避免會有遺漏，會有不全面之處。因而值得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綜合上面各種觀點和見解，再結合我們在河北某縣鄧家莊的田野工作所得到的資料，我認為在討論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他們的地位和作用的時候必須既注意國家(政權)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這種作用——在排除了“決定”和“認可”兩種含義之外——

更具有有一種導向性)，也注意社區中各種政治力量的作用及精英本身的作用。同時，也必須給精英的選拔和其所發揮的作用以一種動態和歷史的考察，注意到他們發揮作用的現實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注意到現有精英和以往精英之間的歷史延續性。因此，我的基本觀點是，精英的選拔和更替是多種合力的結果；精英在社區中的地位 and 發揮的作用由於其所處的位置——在官系統和民系統接觸的邊際地位¹²——從來就是多重性的。

這裏將鄉村政治精英定義為“在農村社區生活中發揮着‘領導、管理、決策、整合的功能’的人”，¹³ 本篇論文主要在行政村（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層面上討論這一問題。應該說明的是，我在這篇論文中無意挑戰上述這些見解和觀點，只是希望用我們田野工作的資料對這些見解和觀點加以補充和少許的修正。

2. 分析框架

i. 村莊的“自由”政治空間

有一種看法認為，在1949年革命勝利之後，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對全國農村的全面控制和組織，從而徹底改變了1949年前國家的力量無法（完全）達到農村行政村這一級基層的態勢。¹⁴ 我則對這一點存有疑問。毫無疑問，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就其主觀願望來說是想實現這一目標，但是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卻無情地阻止了這一目標的實現或完全實現。所謂村莊的“自由”政治空間（即村幹部可以按照自己個人或社區的利益來安排村莊的實